

清代私家藏书与学术发展之互动关系

陈 东 辉

清代乃中国古代私家藏书最为兴盛的时期,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,都是前所未有的。据范凤书在《中国私家藏书史》^①一书中的统计,有清一代确有文献记载藏书事实者,共计2082人,超过了此前历代藏书家的总和。笔者认为,清代私家藏书之所以如此发达,原因是多方面的,而学术发展应是其中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,并且清代私家藏书与学术发展存在着互为因果、互相促进的互动关系。

众所周知,清代系中国学术史上集大成的重要时期,一大批学者在众多领域取得了辉煌璀璨的成果。清代学者取得最大成就的是朴学领域,包括文字、音韵、训诂、目录、版本、校勘、辨伪、辑佚、编纂等,而从事朴学研究,当时主要依靠私家藏书。可以这么说,朴学的昌盛,从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私家藏书的兴旺。

清代学者大多本身拥有较多的藏书,主要是靠自己的藏书做学问,同时也利用他人的藏书。清初著名学者朱彝尊,曾参修《明史》,著有《经义考》、《日下旧闻》、《曝书亭集》等,并编纂了《明诗综》和《词综》,堪称著作等身。由于学术研究的需要,朱氏购买和抄录了大量书籍。他在京参修《明史》期间,经常从史馆借抄,并借抄于宛平孙氏、无锡秦氏、昆山徐氏、晋江黄氏、钱塘龚氏、宁波范氏等明末清初的藏书世家,历年所抄达3万余卷,占其全部藏书的近40%。朱彝尊家有藏书三十椋,近8万卷,在其老家浙江秀水(今嘉

兴)梅会里建有著名的藏书楼“曝书亭”。为了搜求典籍,他的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。丰富的藏书,为朱氏的研究提供了极大便利。朱氏的重要著作《经义考》,乃规模宏大的专科版本目录学著作,取材宏富,辨订群书,识断通核,是研究中国古代学术文化史的重要工具书。试想如果没有“曝书亭”的大量藏书作基础,是难以写成《经义考》的。

又如清代中期的陈鱣,精于经学及文字学、训诂学,著有《经籍跋文》、《石经说》、《两汉金石记》、《埤苍拾存》、《声类拾存》、《恒言广证》、《续唐书》、《松砚斋随笔》、《简庄文钞》等。阮元称其“于经史百家靡不综览”、“浙西诸生中经学最深者也”^②。与当时的著名学者钱大昕、王念孙、翁方纲、段玉裁等交往颇多,他们都敬重陈鱣的学问。为了从事经学等的研究,陈鱣一生中收藏图书达10余万卷,其在浙江海宁的藏书楼名为“向山阁”,与黄丕烈士礼居、吴騫拜经楼齐名。陈氏藏书的特色与其学术旨趣紧密相关。他对经学研究颇深,其藏书亦多宋元刊经部珍本,内中不少系用重金收购而得。据清代浙江海盐藏书家钱泰吉在《曝书杂记》中的记载,陈鱣藏有宋刻《周易注疏》、《周易本义》、《尚书孔传》、《尚书集传》、《毛诗传笺》、《周礼注》、《礼记注》、《礼记注疏》、《尔雅单疏》、《大学章句》、《中庸章句》、《论语集注》和《孟子集注》等。^③陈鱣还利用收藏经书众多的有利条件,对有关经书进行了校勘,最后汇成《经籍跋文》19篇,学术价值甚高。

再如晚清大学者孙诒让,一生博览群籍,锐意治学,著述宏富。他在经学、训诂学、校勘学、文字学、甲骨学、金石学、文献学、目录学、诸子学等领域均卓有成就,给后人留下了《周礼正义》、《墨子间诂》、《札迻》、《籀庖述林》、《古籀拾遗》、《名原》、《契文举例》、《温州经籍志》等多种著作。孙诒让的学术成就,是与他和他的父亲孙衣言所创建的著名藏书楼——“玉海楼”分不开的。玉海楼曾有藏书八、九万卷,除了一般的经、史、子、集四部书外,还度藏了大量浙江

地方文献,其中温州地区历代学者的著述即有460多种,内有明刊本32种、明钞本2种、钞本210种、稿本10种、传钞稿本1种、日本刊本1种。这些典籍大多经过有关学者的批校,价值颇高。上述藏书,为孙诒让撰写《温州经籍志》、《温州古甓记》、《温州建置沿革考》、《瑞安建置沿革考》、《永嘉郡记集本》及孙氏父子编刻《永嘉丛书》提供了极大便利。此外,孙诒让还对玉海楼中的许多藏书进行了批校和考释,如他的名著《札迻》,即为校释78种古籍的学术笔记,计有校文1300余条。

由此可见,清代私家藏书大多是由于学术研究的需要而建立起来的。根据范凤书所著的《中国私家藏书史》^④一书的统计,确有文献记载的清代收藏万卷以上的藏书家共有543人。笔者经过仔细查考,发现这543人中大多是学者。同时,清代的许多朴学大师,如钱曾、朱彝尊、徐乾学、何焯、杭世骏、张金吾、卢文弨、王昶、鲍廷博、朱筠、李文藻、周永年、毕沅、翁方纲、桂馥、汪中、顾广圻、陈鱣、孙星衍、江藩、严可均、黄丕烈、阮元、洪颐煊、李兆洛、陈寿祺、严元照、俞正燮、梁章钜、钱泰吉、马国翰、许瀚、朱绪曾、陈澧、邵懿辰、莫友芝、孙诒让、姚振宗、朱学勤、丁丙、李慈铭、杨守敬、缪荃孙、朱一新、叶昌炽、江标、王仁俊等,藏书均达万卷以上。

值得注意的是,清代学术最为发达的江浙地区,同时也是私家藏书最为兴盛的地区。张之洞的《书目答问》中附有《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》,其中经学家共计202人,江浙有136人,占67.3%;史学家共计91人,江浙有69人,占75.8%;小学家共计63人,江浙有43人,占68.3%;校勘之学家共计31人,江浙有22人,占71%;金石学家共计46人,江浙有35人,占76.1%。可见在清代学术史上,江苏和浙江占有绝对的优势。与此相应,清代江浙地区的藏书家人数众多。据吴晗《江浙藏书家史略》^⑤一书统计,清代江苏有藏书家290人,浙江有267人,其中包括许多海内闻名的藏书大家,而藏书质量更是其他地区无与伦比的。在同一个省内,学术发展促进私家藏书兴盛的

情况也十分明显。以浙江为例,在清代,该省学术文化事业最为发达的当数杭州、宁波、绍兴、嘉兴和湖州,这些地区的私家藏书也远较浙江其他地区兴旺。此外,在清代北方诸省中,学术较为发达的有山东、直隶(含京师),这两个省的藏书家也是北方各省中最多的。

上文论述了清代学术发展促进了私家藏书的兴盛。从另一个角度来考察,私家藏书之兴盛,反过来又促进了清代学术尤其是朴学的发展。首先,私家藏书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大量图书。可以这么说,如果没有大量的私家藏书的支撑,清代学术尤其是朴学研究要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几乎是不可能的。蔡尚思在论及藏书与学术研究的关系时云:“藏书的风气大盛,如钮氏世学楼、祁氏淡生堂、黄氏千顷堂、钱氏绉云楼、郑氏丛桂堂、徐氏传是楼,尤其是范尧卿的天一阁,藏书甚富;毛子晋父子的汲古阁,前后积书八万四千册。没有明末这批私人大图书馆,清初黄宗羲等人能博览群书,广搜史料吗?”^⑥清顺治七年(1650),黄宗羲赴绉云楼借书,钱谦益破例允其观书。黄氏看了钱氏丰富的藏书后,有云:“得翻其书籍,凡余之欲见者,无不在焉!”^⑦兴奋之情,溢于言表!

钱大昕乃清代数一数二的朴学大师,著述宏富。与一些著名藏书家相比,钱氏的藏书并不算十分丰富,但他在治学过程中,曾多次向黄丕烈、袁廷桢、卢文弨、周锡瓚、顾之逵、戈宙襄、严元照、何元锡、刘桐、吴騫等人借抄图书^⑧,遂使他的学术著作益发博大精深。此外值得一提的是,由于某些善本钱大昕未曾寓目,从而使他的个别考证的精确性稍受影响。如傅增湘在为《校史随笔》^⑨所作的“序言”中指出:“窃惟史籍浩繁,号为难治。近代鸿著,无如王氏《商榷》、钱氏《考异》、赵氏《札记》。三君皆当代硕儒,竭毕生之力以成此书。其考辨精深,征引翔实,足为读史之津寄。然于疑、误、夺、失之处,或取证本书,或旁稽他籍,咸能推断,以识其乖违,终难奋笔以显为刊正,则以未获多见旧本,无所取证也。第旧本难致,自昔已

然。钱氏晓征博极群书,然观其《旧唐书考异》,言关内道地理于今本多所致疑,似于闻人诂本未全寓目。明刻如此,遑论宋、元。”同时,钱、王凭借个人学识指出的《五代史记》时本中的某些错误,在张元济所见之宋庆元刊本中不误,并且尚有不少未及指出者。^⑩从某种意义上说,钱、王的上述考订变成了无效劳动。如果他们当时能见到较多的宋元善本,那么就不会出现上述问题了,《廿二史考异》和《十七史商榷》的质量也将更高。这一事例,从反面说明了私家藏书对学术研究的重要作用。

值得一提的是,我国现存历史最为悠久的私家藏书楼——天一阁,虽然在建阁之初就确立了“代不分书,书不出阁”的制度,对登阁观书也限制得很严,但是仍有一些学者如黄宗羲、万斯同、全祖望、钱大昕、鲍廷博、张海鹏、阮元等,获得特许而有幸登阁观书。其中黄、万、全三人系浙东学派之大师,可见天一阁对浙东学术的繁荣与发展作出过积极的贡献。清初徐乾学的传是楼藏书甚富,万斯同《传是楼藏书歌》赞曰:“玉峰当代盛人物,君家昆弟真英豪。论才宇内原无双,积书寰内亦第一。”^⑪康熙年间徐乾学设局纂辑《大清一统志》,延聘阎若璩、胡渭、顾祖禹、黄仪、姜震英、查慎行、黄虞稷等著名学者分纂。胡渭借此机会充分利用传是楼的丰富藏书,^⑫最终完成了《禹贡锥指》这一清代学术史上的名著。诚如梁启超所云:“这部书虽然有许多错处,但精勤搜讨,开后来研究地理沿革的专门学问,价值当然也不可磨灭。”^⑬顾祖禹的传世名著《读史方輿纪要》,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传是楼的众多藏书。

清代一些藏书家较早地意识到不秘私藏、互相交流的重要性。清初藏书家曹溶在《流通古书约》中,曾明确指出藏书家最重要的社会职责在于流通阅读,而不仅仅是收藏保管,务使历代珍贵典籍,不以深锁秘藏而与世隔绝。乾隆时期的著名学者和藏书家周永年受曹家伦之影响,提出了“儒藏”说。《儒藏条约三则》^⑭较为充分地反映了周永年的藏书思想,其中有云:“儒藏不可旦夕而成,先

有一变通之法。经、史、子、集,凡有板之书,在今日颇为易得。若于数百里内,择胜地名区,建义学、设义田,凡有志斯事者,或出其家藏,或捐金购买于中,以待四方能读之人,终胜于一家之藏。即如立书目,名曰‘儒藏未定目录’。由近及远,书目可以互相传抄,因以知古人之书,或存或佚。凡有藏之处,置活版一副,将秘本不甚流传者,彼此可以互补其所未备。如此则数十年之间,奇文秘籍,渐次流通。始也积少而为多,继由半以窥全。力不论其厚薄,书不拘于多寡。人人可办,处处可行。一县之长官可劝一县共为之,一方之巨族可率一方共为之……凡四方来读书者,如自能供给,即可不取诸此,寒士则供其食饮。须略立规条,如丛林故事。极寒者并量给束脩,免其内顾之忧。有余仍贮存之,以为置书增田之费。”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,周氏买田筑藉书园,聚书其中,招致来学。章学诚《周永年别传》^⑮曰:“余因与桐^⑯往见书昌^⑰于藉书之园。藉书园者,书昌之志也。书昌故温饱,橐餗于书,积卷殆近十万,不欲自私,故以藉书名园,藉者借也。”周永年的好友桂馥,也将自己的全部藏书捐献给藉书园。藉书园之类的私人藏书,已初步具备私立图书馆的性质,为广大学者尤其是家境贫寒的学者读书治学提供了有利条件,从而促进了学术事业的发展。可惜这样的私家藏书数量太少。

《四库全书》的编纂,堪称清代学术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。私家藏书为《四库全书》的编纂作出了无可替代的重大贡献。台湾学者曾对《四库全书》所依据的底本作了统计,数据如下:

	著录	存目	小计
官府藏书	866	547	1413
私人进献	696	1500	2196
各省采进	1449	3963	5412
官绅进献	358	696	1054
通行本	100	87	187
小计	3469	6793	10262

作者在分析以上数据时指出:“案表中所列之‘依据书本’虽有

五类,然其中‘私人进献’、‘各省采进’、‘官绅进献’三项,实多出自藏书之家,或可合并计之。在著录方面,出自藏书家的共2503种,占著录总数72.15%。存目方面,则有6159种,占存目总数90.67%。如合并著录与存目计算,来自藏书家的部分共8662种,占全书84.4%,由私人藏书在四库中所占之比例,藏书家之实质贡献,可以想见。”^⑩范懋柱、鲍士恭、马裕、汪启淑、吴玉墀、汪汝璥、汪如藻、孙仰曾、周厚堦、蒋曾莹、黄登贤、励守谦、程晋芳、纪昀、朱筠等藏书家为《四库全书》的编纂进献了大量图书,其中又以前四人献书为最多,均各达五、六百种,被称为“献书四大家”。可以这么说,如果没有私人藏书家的大量献书,那么要编纂《四库全书》几乎是不可能的。

另一方面,《四库全书》的编纂对私家藏书产生了重大影响。首先,它极大地震动了中国私家藏书群。此前私家藏书基本上是默默无闻、自隐自发地进行着,国家一般不过问,既不鼓励,也不制止。自从开始编纂《四库全书》后,乾隆皇帝反复下达谕旨,动员各地藏书家呈献书籍,并对献书者给予奖励。献书500种以上的范懋柱等4人每人获赏《古今图书集成》一部,献书100种以上的吴玉墀等9人各获赏《佩文韵府》一部。其次,此次大征书也是对清代中期私家藏书的一次大检阅、大评比。通过进呈书籍,基本亮明了哪些省份、哪些地方有多少大藏书家,及其收藏情况。其三,通过全国性的大规模采购、征集图书的活动,尤其是对大藏书家的奖赏措施,可以视为对私家藏书事业的一次大鼓励和大推动,因而清代私家藏书事业在乾隆以后有了很大发展,出现了许多大藏书家。同时还促进了像北京琉璃厂等地的古旧书业的相应发达和兴旺,又为私家藏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更大便利。其四,《四库全书总目》的编撰,乃中国目录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。它对后世的学术研究不仅影响深远,也为私家藏书的分类编目提供了一个现成的榜样,此后私家藏书的编目很少脱其窠臼。《总目》成为许多藏书家采购、收藏图书

时的重要依据和线索,并成为他们读书治学时的权威指导目录。《总目》对清代的学术藏书活动起了重大的指引作用。^{①9}

清代藏书家大多具有渊博的学识,不少人乃是有影响的一代大师。他们利用丰富的藏书,积极从事目录、版本、经学、小学、史学、文学等领域的研究,以及校勘、辨伪、辑佚、编纂、刊刻等方面的学术活动,为清代学术的繁荣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。黄丕烈之“士礼居”、“百宋一廛”的藏书堪称乾嘉时期藏书的杰出代表,也是中国藏书史上罕见的突出典范。近人陈登原云:“乾嘉间之藏书史,可谓百宋一廛之时代允矣。”^②黄丕烈一生共批校了700多种古籍并撰写了题跋。这些题跋说明该书的来龙去脉,介绍作者的情况,区别刻本的优劣,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都很高,影响颇大。古旧书行业一直流传有“顾批黄跋”的说法。凡是一部由黄丕烈写题跋、作校勘的书,就身价倍增。《尧圃藏书题识》、《尧圃藏书题识续录》和《尧圃藏书题识再续录》,收录黄氏题跋共计800余篇,成为后人研究古典文献学和清代学术文化史的重要资料。

马国翰一生不遗余力地搜求古籍,每见异书,手自抄录,薪俸所余,尽以购书,故藏书甚富,多达5万7千余卷。马氏利用丰富的藏书,积数十年精力编纂成著名的《玉函山房辑佚书》。该书乃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部私刻辑佚书。原书共收书632种,计700余卷,马氏卒后有所散佚,现存的版本收书580余种,计600余卷。全书分为经、史、子三编,其中经部收书最多,达400余种。因该书所收的经学著作数量多、范围广,超过此前的同类辑佚书,故对研究唐代以前之经学价值颇大。诚如李慈铭所云:此书“寻拾奇零,综理微密,虽多以朱竹垞《经义考》、马宛斯《绎史》、余仲林《古经解钩沉》及张介侯(澍)《二酉堂丛书》等为蓝本,而博稽广搜,较之王氏(谟)《汉魏遗书》,详略远判。”^③王重民也指出:此书“搜罗的完备,卷帙的繁富,是以前任何人所不及的!”^④该书所收各书之前,马氏均撰有序录,论及该书的流传、存佚及作者等情况,并间有考辨。如《周易

何氏讲疏》系隋代何妥所撰,然而《册府元龟》据《隋书·经籍志》之误字,遂云其作者为何晏。朱彝尊《经义考》因之,辗转承讹。“国翰详为辨证,实有裨于经学。”^②

清代藏书家在目录学、版本学领域成绩卓著。钱谦益的《绉云楼书目》,钱曾的《也是园书目》、《述古堂藏书目》、《读书敏求记》,黄虞稷的《千顷堂书目》,孙星衍的《平津馆鉴藏书籍记》,黄丕烈的《士礼居藏书题跋记》、《尧圃藏书题识》、《百宋一廛书录》,周中孚的《郑堂读书记》,张金吾的《爱日精庐藏书志》,瞿镛的《铁琴铜剑楼藏书目》、《铁琴铜剑楼藏宋元本书目》,邵懿辰的《四库简明目录标注》,莫友芝的《邵亭知见传本书目》、《宋元旧本书经眼录》、《持静斋藏书纪要》,李慈铭的《越缦堂读书记》,丁丙的《八千卷楼书目》、《善本书室藏书志》,杨绍和的《楹书隅录》、《海源阁藏书目》,陆心源的《皕宋楼藏书志》、《仪顾堂题跋》等,均为高质量的书目题跋之作,在中国目录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。其中的《读书敏求记》由清初著名藏书家钱曾所撰,收录钱氏藏书中精华部分634种,专记宋元精刻。该书开创了藏书题跋记形式的目录新体裁,同时还开拓了目录学中版本研究的新领域,为版本目录学的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。钱氏在书中总结出了图书版本鉴定方法上的不少规律,其中主要是以版刻、字体、纸墨、校补状况以及内容等为依据,考定图书雕版刷印的年代及版本优劣,为后人研究版本提供了宝贵经验。清代中叶以后,受该书之影响,版本目录学逐渐发展成为显学,产生了大量的善本书目录和题跋记等著作。此外,钱氏对该书所著录图书的评价与考辨,都援引了比较丰富的资料,颇为学者所重。清代学者阮福重刻该书时尝谓:“遵王此书述著作之源流,究缮刻之同异,留心搜讨不遗余力,于目录书中洵为佳著。”^③评论堪称允当。

清代私家藏书与学术发展关系密切。上文提及,清代学术最为发达的江浙地区,同时也是私家藏书最为兴盛的地区。这是就整个清代而言,如果仅仅看晚清时期,那么情况有所不同,该时期广东

的学术和藏书事业发展迅速,在某些方面大有超越江浙之势。在清代道咸以前的很长一个时期内,全国的学术中心一直在江、浙、皖一带,而被称为“炎荒僻壤”之地的广东的学术空气相对较为薄弱,私家藏书也较少。编纂《四库全书》时,广东仅进呈了12种书,名列全国倒数第2位。藏书的不足,从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学术的发展。清初广东著名诗人屈大均对此深有感慨:“我生南海愁偏僻,经史之外寡书册。扁舟遥至金陵城,欲向名家求载籍。”^⑤阮元于嘉道年间任两广总督时,在广州建立了学海堂,逐渐成为当时全国最有影响的书院之一。阮元的学海堂开设经古之课,积极倡导学术研究,从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当地学术的繁荣与发展。^⑥从19世纪中叶起,全国的学术重心开始转向岭南,而又逐渐波及到附近的荆楚地区。学术的繁荣,也促进了私家藏书的发展。同光以降,广东出现了丁日昌“持静斋”、孔广陶“三十三万卷书堂”(又名“岳雪楼”)、方功惠“碧琳琅馆”、伍崇曜“粤雅堂”、潘仕成“海山仙馆”、康有为“万木草堂”、莫伯骥“五十万卷楼”、潘宗周“宝礼堂”、伦明“续书楼”、徐信符“南州书楼”等著名藏书家及其藏书楼。丰富的藏书促进了广东的学术发展,其间的互动作用十分明显。

从总体而言,清代北方地区的学术发展明显不如南方地区,与之相应,北方地区的私家藏书也明显不如南方地区多。藏书不足,从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北方学者的视野,对学术的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。桂馥曾云:“北方学者,目不见书,又鲜师承,是以无成功。”^⑦桂馥所言,固然有些偏颇,但也不无道理。这一情况,也可以从反面说明清代私家藏书与学术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。

注:

①④大象出版社2001年版。

②《定香亭笔谈》。

③参见《曝书杂记》卷上。

⑤中华书局1981年版。

⑥《中国文化史要论(人物·图书)》(增订本),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。

⑦黄宗羲:《天一阁藏书记》。

⑧参见《竹汀先生日记钞》卷一。

⑨张元济撰,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。

⑩参见《校史随笔》中“五代史记·钱大昕考异所指此不误”条、“五代史记·王鸣盛商榷所指此不误”条和“五代史记·时本讹夺多可纠正”条,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。

⑪转引自《藏书纪事诗(附补正)》卷四《徐乾学健庵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。

⑫杭世骏:《道古堂文集》卷四十《胡东樵先生墓志铭》。

⑬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,《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》(朱维铮校注)本,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。

⑭⑮载《中国历代国家藏书机构及名家藏读叙传选》,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。

⑯邵晋涵,字与桐。

⑰周永年,字书昌。

⑱蓝文钦:《铁琴铜剑楼藏书研究》,台湾汉美图书有限公司1991年版;转引自傅璇琮、谢灼华主编:《中国藏书通史》,宁波出版社2001年版。

⑲参见范凤书:《中国私家藏书史》,大象出版社2001年版。

⑳《古今典籍聚散考》,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。

㉑《越缦堂读书记》,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。

㉒《中国目录学史论从》,中华书局1984年版。

㉓《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·经部·易类》,中华书局1993年版。

㉔清道光五年(1825)小琅嬛仙馆《读书敏求记》刻本序。

㉕《翁山诗外》卷三《过黄俞邠藏书楼作》。

㉖参见拙作《阮元与学海堂》,载《文史》第41辑,中华书局1996年版。

㉗《晚学集》卷七《周先生传》。

作者工作单位: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